



中国历代通俗演义

后汉演义

上册

蔡东藩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中国历代通俗演义

后 汉 演 义
上 册

蔡 东 藩 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何和一

责任编辑：金 名

后 汉 演 义 上 册

蔡 东 藩 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5 插页 2 字数 308,000

1979 年 8 月新 1 版 197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10077·3003

定 价：1.30 元

蔡东藩与《中国历代通俗演义》

吴 泽

—

我们的伟大祖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。她在历史上虽然也曾出现过多次分裂割据的局面，但作为中华民族整体的历史传承来说，几千年间从未中断过，一直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，兼收并蓄各兄弟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，一脉相承到今天，这是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的。

中国历史的记载和编纂，早在殷周时代便出现了。特别是秦汉以来，史家辈出，各种各样体裁的史书，多得难以胜数。就拿系统地记载我国从古到明代历史的一部二十四史来说，多到三千二百余卷。其中西汉司马迁写的一部《史记》，就有一百三十篇。此书纪事起自传说的黄帝，迄于汉武帝，首尾共三千年左右的史事，为我国第一部贯通古今的纪传体通史。东汉班固所撰《汉书》，也有一百篇，分一百二十卷，记载西汉一代的史事。此后南朝刘宋范晔的《后汉书》、西晋陈寿的《三国志》，直至清张廷玉等修撰的《明史》等史书，均是承自班固《汉

书》的纪传体断代史体裁。一部二十四史，除《史记》是通史体裁外，其它二十三史都是这种纪传体断代史。这些断代史体裁一致，代代相銜，自成体系，是世界各国历史著作中所罕见的。

纪传体以帝王的传记为纲领，被称为“正史”，北洋军阀时期把近人柯邵忞写的《新元史》列入“正史”，人们统称之为二十五史。此外赵尔巽等还汇集清代一代史事，编写成一部《清史稿》。二十四史有三千二百五十九卷，再加《新元史》二百五十七卷和《清史稿》五百三十六卷，总数多达四千零五十二卷。卷帙浩繁，一个史学工作者要尽读这么多史书，确非穷年累月毕生以赴不为功。这些史书都是出自封建士大夫和史官手笔的高文典册，不仅史事内容，头绪纷繁，史料芜杂，一般人望而生畏，不敢去读；就是读了也不易读懂读通；因此，如何使这些高文典册的历史知识，能广为传播到人民群众中去？这个问题，早在唐宋时代就有一些平民文学家开始注意了。

说书，原是民间艺术形式之一。敦煌发现《昭君变》、《伍子胥变文》等等大批写史变文，北宋时有“说三分”与讲《五代史平话》的。南宋时讲“孙庞斗智”、“刘项争雄”，讲《汉书》与晋、宋、齐、梁诸书，讲《《通鉴》、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》；诸宫调唱《刘智远》，有的还说新话；张、韩、刘、岳，说铁骑儿，讲《中兴名将传》等当代抗金时事。元代“尝以野史作为评话”，现在流传的有《三国志平话》、《武王伐纣平话》、《七国春秋》（后来演变为《孙庞演义》与《走马春秋》）、《秦并六国》、《前汉书平话》（续集）等五种全相平话。明代评话、词话章回小说盛行，明清间，特别到晚清，历史演义小说日盛一日。以《东周

列国志》来说，它原是明末冯梦龙依据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和《史记》等史传，将嘉靖隆庆年间余邵鱼撰辑的《列国志传》修订成名叫《新列国志》，共一百零八回。清代乾隆年间前后，蔡元放对此书加上“评语”和“批语”，加工删改成为《东周列国志》。至于《隋唐演义》等等，内容多民间传说，较为芜杂，但它和《东周列国志》所起影响，也是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、《隋书》和《唐书》所及不到的。明清以来的这些长篇历史演义小说，成为我国历史书中所特有的一种民族风格的体裁，在历史知识的传播上，起着所谓“正史”的二十四史所不能起到的作用。

二

蔡东藩，名邨，字椿寿，浙江萧山临浦镇人，生于一八七七年（清光绪三年，丁丑），卒于一九四五年，年六十九岁。他二十岁前已中秀才，清末以优贡生朝考入选，调遣江西省以知县候补，到省不久，看不惯官场恶习，称病归里。辛亥革命前曾一度去福建，不久即归，一直住在临浦镇家里。辛亥革命胜利后不久，经好友山阴人邵希雍介绍，和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发生关系，修改邵著《高等小学论说文范》，他自己另撰《中等新论说文范》，并开始为会文堂书局撰写《中国历代通俗演义》，一九一六年《清史通俗演义》问世后，接着写元史、明史、民国、宋史、唐史、五代史、南北史、两晋、前汉等通俗演义。到一九二六年九月才写完最后一部《后汉演义》。蔡东藩的这部书，从秦始皇写起，直写到一九二〇年，共写了两千一百六十六年的

历史。全书一千零四十回，五百多万字，均由会文堂书局陆续印行。到一九三五年，会文堂书局加上许廼父续的《民国通俗演义》四集四十回，全部改印，总书名曰《历代通俗演义》，分装四十四册。这样一部自秦汉写到民国，系统完整，独力完成的历史演义书，确是空前的巨著。此书印行后深为广大读者所欢迎，销行数量很大。一九二七年，蔡东藩病，旋任临浦小学语文教师。抗日战争开始后，临浦镇沦陷，他离开家乡，辗转避难，受尽颠沛流离之苦。一九四五年春，他终于病倒了，没有看到抗战胜利，怀着国仇家恨悲愤地与世长逝。

蔡东藩生活的时代，正是国事维艰、风雨飘摇的历史大变动时代。同他一样怀着“国亡有日”的预感的爱国知识分子，从不同的世界观出发，象毛主席在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一文所描写的，寻求着救国奇术、济世良方。“小说救国”、“演义救国”的呼声，在清末的各种期刊上，象雨后的蛙鸣似的传播开来。

早在一八九七年（清光绪二十三年）就创刊了一份《演义白话报》，报上曾刊载一篇《通商原委演义》，共二十四回，专写鸦片战争历史，后来改出单行本时，书名叫《罌粟花》。一九一二年（民国元年）上海书局刊行自由生著的《新汉演义》，共四十回，专写自武昌起义到南京政府成立这段辛亥革命的历史。这年，广益书局也刊行雪巷写的《神州光复志演义》，共一百二十回，演写明亡至民国成立的清代历史。清末民初还有《太平天国演义》、《洪秀全演义》等等书刊。当时说部叙史的，有记、花、传奇和演义四种，除传奇为剧本，其它主要在于说史，记、花属于纪事本末，只限于一事，“演义”则是说专史。蔡

东藩的《清史通俗演义》，就是在辛亥革命后一九一五到一九一六年间（民国四、五年间）在《神州光复志演义》等演义救国思潮影响下写成的。这期间，吴趼人曾发表《历史小说总序》，可惜在刊行《西晋演义》之后，这计划就夭折了，而完成吴趼人等一生梦寐以求的宏愿的，却是当时名不见经传的饱受书商的剥削与冷遇的蔡东藩。

蔡东藩善诗、能医，诗作在亲友中不胫而走，著有医学与文字学专书。而《中国历代通俗演义》是他著作中最具规模、最有影响的一种。这是他，作为一位埋头苦干的老教育家、医生、历史学家与演义作家，对祖国所作的惊人的贡献。

三

《中国历代通俗演义》是一套体例特殊、自批自注的演义巨著，突出地反映着蔡东藩的演义观点与历史观点。

罗贯中的《三国演义》和冯梦龙、蔡元放的《东周列国志》原是两种泾渭分流的有代表性的演义作品。罗贯中出入经史，融合了很多宋元以来的话本和民间流传的故事和传说，所谓“七分事实，三分虚构”，而冯梦龙等号称无一事无来历，要把“临潼斗宝”、“鞭伏展雄”之类于史无据的故事逐出演义之林。蔡东藩采取了折中的做法。他认为文史殊途，但演义小说必须以正史为经，虚构不能歪曲史实。他在《唐史通俗演义》自序中说：

以正史为经，务求确凿，以轶闻为纬，不尚虚诬。徐懋功（勳）未

作军师，李药师(靖)何来仙术？罗艺叛死，乌有子孙，叔宝(秦琼)扬名，未及子女。唐玄奘取经西竺，宁惹妖魔，……则天淫秽，不闻私产生男；玉环伏诛，怎得皈真圆耦？种种谬妄琐褻之谈，辞而辟之，破世俗之迷信者在此，附史家之羽翼者亦在此。子虚、乌有诸先生，谅无从窃笑于旁也。

他在《宋史通俗演义》的序文中也说：

宋代小说，亦不一而足，大约荒唐者多，确凿者少。龙虎争雄，并无其事；狸猫换主，尤属子虚。狄青本面涅之徒，貌何足羨？庞籍非怀奸之相，毁出不经。岳氏后人，不闻朝中选帅；金邦太子，曷尝胯下丧身？种种谬谈，不胜枚举。而后世则以讹传讹，将无作有，劝善不足，导欺有余。为问先民之辑诸书者，亦何苦为此凭虚捏造，以诬古而欺今乎。

他写历史演义即或采用稗官轶闻时，认为必须要以有旁证者方可。他在《明史通俗演义》的自序中还说：“若夫燕词郢说，不列正史，其有可旁证者则概存之，其无可旁证而大涉荒唐者，则务从略，或下断语以明之。文不尚虚，语惟以俗，盖犹是元清两演义之故例也。”他叙述整理明代史料的情况说：

尝考《明史》凡三百三十二卷，《明通鉴纲目》凡二十卷，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凡八十卷，每部辑录，多则数千百万言，少则不下百万言，非穷数年之目力不能举此三书而遍阅之。况乎稗乘杂出，代有成书，就令有志稽古，亦往往因材力之未逮，不遑搜览，即搜览矣，凭一时之懒祭，能一一记忆乎？且官私史乘，互相勘照，有同而异者，有异而同者，有彼详而此略者，有此讳言而彼实叙者，是非真伪之别，尤赖阅史者之悉心鉴衡，苟徒事览观，能一一明辨乎？

他怕读者虚实难辨，误虚为实，蒙受不正确的历史知识，因此，常在正文或批注中作出简明的批斥，做好交待。例如：《宋史通俗演义》十六回写到陈搏之死时说：

陈搏系一隐君子，独行高蹈，不受尘埃，若目他为仙怪一流，实属未当。俗小说中或称为陈搏老祖，捏造许多仙法，作为证据，其实荒唐无稽，请看官勿为所惑哩！

又如：《后汉演义》八十二回，写到刘备请到了诸葛亮，与关羽、张飞同至新野，由徐庶接入，故人聚首时，下注说：“徐庶走马荐诸葛，出自罗氏《演义》，按《蜀志》诸葛传中，庶尚留新野，未曾诣操，今从之。”八十四回写到徐庶辞刘备归曹操时，也下注说：“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详载此事，庶归曹操，系在备当阳败后，且庶母亦不闻自杀，与罗氏《演义》不同。”

遇有正史记事和稗史轶闻所载史事有所出入时，他并不是一意迷信正史，还是能权衡事理，择善而从，例如《宋史通俗演义》三十七回写到知广德军朱寿昌弃官寻母条时，他下注文说：“《宋史·寿昌本传》谓刘氏方娠即出，寿昌生数岁还家。但据王偁《东都事略》、苏轼《志林》皆云寿昌三岁出母，今从之。”

遇到正史和野史的记事有所出入，难于决择时，他常取存疑或折衷方法。例如：

《明史通俗演义》第二回郭子兴在濠州遭孙德崖和赵均用暗谋时，朱元璋往救之，注云：此事悉本《太祖本纪》。惟本纪叙此事，在濠未被围之前，而谷著《纪事本末》，则言此事在被围之时，且事实间有异处，本编互参两书，以便折衷。

第四回关于孙德崖邀宴事以及孙德崖下落，不见正史，无

文可征，据稗官补写“探虎穴约会孙德崖”，总批云：“至若孙德崖邀宴事，未见正史，而稗乘相传，及乡曲妇孺俱知有兴隆会一事，或者史官失载，亦未可知。且德崖与子兴并起，子兴生卒，及其子天叙之存亡，史笔俱详，而德崖不见下落，其有阙文也无疑。作者援引稗官，补入此事，有文征文，无文征献，宁得以虚诬目之。”

尽管如此，蔡东藩仍然陷入矛盾。作为一个史学家，甚至是一个具有考据癖的史学家，他有意无意的摆脱不了史料的束缚。在理论上他承认演义是文学，要以情动人，有别于史学；全书描写情景，逢有得意之笔，他会情不自禁地加以批注。历代成功的演义与小说，特别是《三国演义》与《水浒》，在塑造人物形象与借景抒情等方面给予他很大的帮助，他应该重视罗贯中的经验与成就。然而，他一面看到历史小说之长；一面又为史料所拘束，他在《前汉演义》第二十五回的后批中说：“夫正史尚直笔，小说尚曲笔，体裁原是不同的，而世人之厌阅正史，乐观小说，亦即于此处分之。……文以载事，即以道情，……是即历史小说之特长也。”可是在《后汉演义》第一回又说：“罗贯中尝辑《三国演义》，风行海内，几乎家喻户晓，大有掩盖陈寿《三国志》的势力。若论他内容事迹，半涉子虚。一般社会能有几个读过正史？甚至正稗不分，误把罗氏《三国演义》当作《三国志》相看。”

这些地方不能不说是作为史学家的蔡氏的偏爱。

蔡东藩写《历代通俗演义》的注文时，除了上面说过的像《通鉴考异》那一套史料考核，对正文中所用某些古代的官制、法制、地理、器物、名号乃至俚语，考虑到一般读者难以理解，

因此也随文作了很多简要的通俗的注释。《前汉演义》里就注了不少。例如：

第五十回，淳于意家居临淄时，“尝至同郡元里公乘阳庆处学医”，注云：“公乘系汉官名，意在待乘公车，如征君同义。”

第七十回，汉武帝接济贰师将军李广利，“又发天下七科谪戍，使他运粮”，注云：“七科，谓吏有罪一，亡命二，赘壻三，贾人四，原有市籍五，父母有市籍六，祖父母有市籍七。”

第二十四回，韩信连胜楚军，“一次是在荥阳附近，二次是在南京地方”，注云：“南京系春秋时郑京，与近今之江宁不同。”

第八十二回，霍光死，宣帝“特赐御用衣食棺槨，出葬时候，用辒辌车载灵柩”。注云：“辒辌车为天子丧车，车中有窗，闭则温，开则凉，故名辒辌车。”

第一回，“萧何原是刀笔吏，叔孙通又是绵蕞生”，注云：“绵蕞系表位标准，绵是置设绵索，蕞是植茅地上，为肄习典礼之处，使知尊卑次序。”

这类注释，通俗易懂，既帮助读者正确理解正文，也给读者增加不少确切的历史知识，是必要的。从这些批注中，人们可以看到作者思想是复杂的，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。有的浸透着传统的封建思想，第二十回，太子早死，朱元璋欲立燕王棣为储君，学士刘三吾抗奏，“孙承嫡统，是今通礼”，“弟不可先兄，臣意谓不如立皇孙”。夹批云：“援经立议，不得以靖难兵变，咎及三吾。”第二十一回，“周王橐次子有劼，曾封汝南王，竟密告橐不法事”，夹批云：“以子证父，不得为直。”有的则闪耀着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光芒，对传统的封建宗法、经义，乃至天道迷信思想多批判之辞。《明史通俗演义》中这类

例子很多，例如：

第二十一回，建文帝用方孝孺议，仿周礼更定官制，“条订礼制，颁行天下”。夹批云：“方氏虽一代正人，然未免迂腐，看他下手，便是急其所缓。”第二十五回，燕王军下盱眙，陷扬州，京师震恐，方孝孺入奏：“今日事急，且许割地议和，暂作缓兵之计，俟至募兵四集再决胜负”。夹批云：“此老又出迂谋。”

第二十一回燕王对贵昌说：“今编户齐民，对着兄弟宗族，尚相顾恤，乃身为天子亲属，性命偏危在旦夕，天下何事可为，亦何事不可为。”夹批曰：“越是帝王家，越不能顾恤宗族，燕王乃犹未知耶？”

第十一回，朱元璋欲火攻陈友谅舟师，需仗风势。铁冠道人说：“真人出世，神鬼效灵。”周颠说：“今日黄昏便有东北风”，夹批云：“此系测算所知，莫视他能呼风唤雨。”

第十八回刘基为胡惟庸用毒药致死，夹批云：“刘基非无智术，惟如后人所传，称为能知未来，不无过誉，使基能预算，何致为惟庸谋毙。”

当其褒贬人物时，亦常用演义小说笔法。马氏曾多次向朱元璋进谏，第三回评道：“好马氏，好贤妇，我愿范金事之。”褒得真切。第二十五回写到建文帝逃出鬼门，乘道人王升舟潜入神乐观时，讽刺地贬辱之云：“想是太祖僧缘未满，故令乃孙再传衣钵。”贬得可也尖刻。

《三国演义》的正文是罗贯中写的，后人毛宗岗等批注的。这些批语、评语既可帮助读者领会原作者的构思、意境、笔法，也可增添读者很多文艺知识，为广大群众所欢迎。因此，这种批注，发展到清末民初，成为演义小说乃至历史演义编写体裁的定式。而且，像蔡东藩写《历代通俗演义》那样，原作者自写

正文，自写批注，并对自己的笔法进行不无得意的自评，读来分外真切。因为别人评点，难免隔靴搔痒，甚至多误解之处，自写自评时，对自己的构思、意境、笔法，自然比别人评点得要真切得多。

四

辛亥革命前，资产阶级改良派中严复和夏曾佑等一翼，既反对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派，也认为康有为搞维新变法操之过激，理由是中国“民智未开”，只有大力兴办教育事业，“民智”启发了，才能谈政治改革。蔡东藩就是这种所谓的“民智决定论”者。

邵希雍，在辛亥那一年为蔡东藩的《中等新论说文范》作序说：“吾同学友蔡君东藩，究心教育有年矣。本岁春，宦游闽中，甫逾月即归，危崖勒马，智士也。夏初与晤申浦，纵谈当世事，蔡君以教育急进为第一代，余深韪之。”辛亥革命后，蔡东藩在《民国通俗演义》第八十回中评论康有为时还说：“彼康有为亦何为者？前清戊戌之变，操之过激，几陷清德宗于死地，……名为保清，实则害清，是不可以已乎！”严复和夏曾佑的改良派思想对他的影响是很深的。

但是，蔡东藩是一位热烈的爱国主义者，他关心国家民族的安危。这年十月，武昌革命促使他的思想起了一个大飞跃。这时他满腔热情，满以为一经革命，全国人民便可御外侮、雪国耻，同享共和的幸福了。可是，清室刚推翻，民国成立不久，军阀割据，帝国主义侵略日急，国事毫无建树，他思绪起伏，在

《国耻论》中说：

革命以后，耳目一新，若可与谋雪耻矣。乃二三雄桀，偶一净志，或且营宫室，拥妾妾，但顾行乐，不顾雪耻。……嗟乎！寇深矣，可若何？而环顾吾国，仍无一誓雪国耻者。夫无一誓雪国耻之人，是终于无耻者也。我不敢谓此终于无耻者其国即亡也，我亦不敢谓此终于无耻者其国不即亡也。惟外族方张，鉴吾国民之不复知耻，将奴我辱我，我国民乃真万劫不复矣。

后来，他在《民国通俗演义》第四十四回：日使迫签丧权辱国条约，袁世凯不敢拒绝，说什么“山东、奉天一带，已遍驻日兵，倘或交涉决裂，他即长驱直入，我将何以对待？”“与其战败求和，不若目前忍痛，从前甲午的已事，非一殷鉴么？”批斥云：“试问甲午之衅，谁实启之？今乃甘心屈辱，想是一年被蛇咬，三年怕烂稻草。”当他写到参政院长黎元洪为此签订辱国条约事发电引咎自责时，他又看到了希望，又热情洋溢地说：“总之是民国以来第一种国耻，全体人民，须时时记着，卧薪尝胆，发愤图存，我中华前途，或尚不至灭亡呢。”接着还下了一个批注说：“大声疾呼，愿国民热度，勿再效五分钟。”往后，军阀内讧，外交失败，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会时的鲁案问题，使他失望痛心。但他看到蒋梦麟和余日章两位人民代表在和会中尚起一定作用时，又给他保留了一线爱国心愿。他在一二九回的总批中说：当时，“诚所谓外患交迫之秋也。当此时代，惟有人民自身力量，还能震慑外人，鲁案即其明证。若信任政府，倚赖军阀，是直召亡而已，爱国云乎哉！”

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初年，接连发生孙中山下野，袁世凯洪宪称帝，张勋复辟等等一系列复辟与反复辟、革命与反革命的

政治事变，民国命脉，真是“不绝如缕”。蔡东藩悲痛不已，文字中表现出他对祖国与民主共和的热爱，反对军阀割据，反对复辟；反对封建专制，拥护民国。他对《临时约法》中有关民主自由的规定，热情赞扬。他在《民国通俗演义》自序中说：

回忆辛亥革命，全国人心，方以为推翻清室，永除专制，此后得享共和之幸福。而不意狐埋狐骨，迄未有成。……所幸《临时约法》，绝而复苏，人民之言论自由，著作自由，尚得蒙《约法》上之保障。草茅下士，就见闻所及，援笔直陈，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。此则犹是受共和之赐，而我民国之不绝如缕，未始非赖是保存也。

他对袁世凯的洪宪称帝事，深为不满。《民国通俗演义》第四十五回写贺振雄和李海呈文严辞指斥杨度等搞筹安会，准备为袁世凯称帝事，作总批云：

贺呈在指斥筹安会，骂得淋漓酣畅，令杨度等无以自容足为趋炎附势者戒。李呈则引证袁氏申令，阳斥筹安会，隐攻袁总统，非特杨度等闻而知愧，即老袁闻之，亦当忆念前言，不敢自悖。然而杨度等之厚颜如故，袁总统之厚颜亦如故，即达官显宦，俱置若罔闻，我不识廉耻为何事。

第七十六回叙袁世凯丧礼后，总批云：袁氏称帝，“小言之，则有背盟之咎；大言之，则有畔国之愆，……乃后起之政府，反盛称其功绩，加厚其饰终典礼，是奖欺也，是助畔也，何以为民国训乎！……呜呼袁氏！呜呼民国！”

蔡锷反对袁世凯称帝，蔡氏称誉他的“倒袁”“护国”，为民国立了特殊功勋。《民国通俗演义》第七十九回说“黄兴创造民国，蔡锷再造民国”，总批云：

“蔡松坡为推翻袁氏之第一人，即为再造共和之第一功，较诸黄克强之奔走革命，劳苦相等，而诣力实过之。……设令天假之年，使得展骥足，保卫国家，未始非人民之福。乃年未强仕，即闻谢世，盗跖寿而颜子夭，古今殆有同慨欤？”

袁氏倒，蔡锷不幸夭亡，其后孙洪伊和徐树铮等府院政客交争，总批接着感叹说：“麟凤死而狐鼠生，华夏其何日靖乎！”他对在京津掩护蔡锷东渡日本潜归云南的妓女小凤仙也赞扬备至。第五十一回总批云：“然如蔡锷之身处漩涡，不惜自污，以求有济，亦可谓苦心孤诣。而小凤仙之附名而显，尤足为红粉生色。巾幗中有是人，已为难得，妓寮中有是人，尤觉罕闻。据事并书，所以愧都下士云。”

他对张勋复辟很反感，骂之为“曲辫子”。对参与张勋复辟的康有为更恼怒。在他看来康有为与梁鼎芬不知清贵族的封建君主专制早已过时，不可再复，而民主共和是时势使然，谁也阻挡不了。第八十六回总批云：“康有为外，又有一个梁鼎芬，是皆为清末之考生，脑筋中只含有事君以忠数语，而未知通变达权之大义者也。”“况种族革命，已成常调，君主政体，不克再燃，即令英辟重生，亦未能违反民意，侈然自尊，更何论逊清之余裔乎！康有为出佐张勋，已同笨伯，而梁鼎芬复往说黎元洪，其愚尤甚。”他对民国的感情确是十分深切。袁世凯称帝，谋叛民国，改元洪宪，民国五年正月元旦，云南唐继尧和蔡锷等护国军兴，第五十八回正文用“民国五年正月朔日”，不称“洪宪”。并在总批中说：“惟袁氏改元，而民国正朔，应归云南护国军接收，故于唐继尧之正朔誓师，直接叙入，不敢少漏，看似寻常补叙，而用笔实寓有深意，阅者当于夹缝中求之也。”